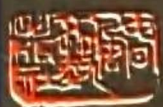


歷代帝王詩選



I222
213

歷代帝王詩選

孫丕任 選注

春風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沈陽

D515144

历代帝王诗选

Lidai Diwang Shixuan

孙丕任 选注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99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1/8 插页：2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65

责任编辑：左云霖 邓荫柯 责任校对：芦雁

封面设计：赵多良

ISBN 7-5313-0128-8/I·118 定价：3.60 元

前 言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在有如恒河沙数的诗歌遗产中，皇帝的诗作也自有其特殊的位置和价值。我国历史上很多皇帝能诗，且有少数可称为诗人。这是我国诗歌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是我国诗歌久远传统的一个侧面，这点曾引起某些外国学者的关注。整理和研究这些诗作也应是古典文学领域中的一个课题，今天已具备了进行这一工作的客观条件。

中国自秦代起，开始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重大转折。自秦始皇起，决定去掉王号，改称皇帝。皇帝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历史的总趋向中自然有其重要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帝王的文学倡导作用。仅就诗歌而言，这种倡导，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讲，都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构成了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刘邦的《大风歌》是现存的第一首帝王诗，朴质自然，不假雕饰。汉武帝才情赡富，能诗善文并创立了乐府。乐府专事采集乐调歌谣和文人诗作，这对乐府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汉末建安

时期，曹操父子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人物，而且是文坛上的领袖人物，王粲、刘桢等辈齐集邺下，标举着共同的文学主张，遒劲苍凉的建安风骨遂著称于世。“曹氏父子对当时文学作风的形成的确是起了提倡和领导作用。”（王瑶《中国诗歌发展讲话》）

南朝滥觞于齐，而风靡于梁陈之间的宫体诗一时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流。其间梁武帝萧衍，特别是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当为执牛耳者。一时间“君倡宫体于上，诸王同声。臣仿宫体于下，妇人同调。”（清吴兆宜语）萧纲对当时的淫靡诗风是十分欣赏的，他曾说：“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萧纲《与湘东王书》）并且断言：以古为是，以今为非，则未之敢许。可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于浮靡诗风的昌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封建经济的发达和都市的繁荣，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帝王的推毂也是重要的人为的因素。据《唐会要》载，唐高宗时的进士科考试，即有了杂文诗赋的内容。以后的进士科经常以诗赋为考试科目。“因此要考中进士和制科，不会吟诗作赋就不行，这当然是诗歌发达的反映，但反过来又驱使当时的士子必须学会做诗。不过，这种应制诗绝非诗歌的主流，但从此却反映出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注重和提倡诗歌。”（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清代史学家赵翼曾指出：“唐诸帝能诗者甚多，如太宗、玄宗、文

宗、宣宗，皆有御制流传于后，而尤以德宗为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唐帝中不能诗者也多能解诗、爱诗，并奖掖拔擢能诗的士子。“宪宗读白居易讽谏百余篇而善之，因召为学士；穆宗读元微之歌诗百余首而善之，立征为舍人。二君不以诗名而好尚乃尔，知唐世人主，亡（无）不喻此道也。”（明胡应麟《诗薮》）明代胡应麟曾强调说：“唐一代之文，所以能与汉并，正赖数君，岂俗子所解。”此话虽失之矫激，但也揭示了唐代诗歌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

即如少数民族统治的辽金时期，也因帝王的提倡，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加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据《辽史》载：辽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他曾“出题诏宰臣以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诸臣读之。”“自圣宗时起，在汉文化影响下，经皇帝之提倡，许多契丹贵族文人也都多作诗编集。”（杨树森《辽史简编》）可见，赵翼“辽族皆好文学”之言信而有征。

清代惩于元明之失，兼学唐宗，形成古典诗歌发展中的后劲之势。清之诸帝自康熙起多有御制集行世，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二位的多产诗人即为乾隆、嘉庆帝父子。乾嘉时期诗人辈出，诗派纷呈。在皇帝周围还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宗室诗人。清代昭槁分析这一原因时指出：“近日科目复盛，凡温饱之家，莫不延师接友，则文学固宜其駉駉然盛也。”（见《嘯亭杂录》）当然，由于文网之严，一些诗人走上了批风

抹月，咏物怀古的道路，缺少具有深厚社会意义的力作，这又从反面体现出帝王、朝廷对于诗歌运动的影响。

诗歌的发展自有其本身的规律，有赖于社会历史所提供的各种条件，不能如刘师培所断言，帝王的倡导是文学兴旺的主要原因，但在文学发展的诸阶段中，帝王个人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由于帝王的特殊社会地位，他们的诗作可能更多地体现了某一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可以补充史料之不足，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的、认识的价值。

比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诗描写了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生灵涂炭的动乱时世。“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使人形象地感受到战乱之中的悲惨景象。南朝宋文帝的诗《元嘉七年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在诗题中就具体地标明了刘宋与北魏战事的时间和地点。此诗生动地描写了刘宋与北魏的战事，并展示了某些细节，表达了战事失利的惋惜和恢复北土的愿望。明成祖的《浞泥长宁镇国山诗》记录了明初与东南亚岛国的友好关系。“炎海之墟，浞泥所处。”“浪泊风樯，实劳恳勤。”由此可知，远在加里曼丹岛的浞泥国于明初即与我国有了交往，这首诗为中外关系史和海上交通史提供了生动的例

证。

清代康熙和乾隆的诗作则更多地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设施。在康熙的诗中，如平三藩、复台湾、征噶尔丹等重大事件都有反映。乾隆更是自觉地以诗记事，以诗记史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予临御六十余年，中间大功屡集，鸿仪迭举。兼以予关心民事，课雨量晴，占年省岁，数十年如一日。其间事之有关大体者，不能不涉笔成章，以昭纪实。”乾隆于三十六年（1771年）所作的《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归顺诗以志事》一诗，在序和详细的自注中记述了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一事，提供了一些正史中语焉不详的细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再如，有些治史者认为“最早披露袁崇焕冤案的是《啸亭杂录》一书。”这是不准确的，最早公布袁崇焕冤案的是乾隆，他在诗中有过详细的描写。不过乾隆的御制诗未能广颁朝野，知之者甚少，所以会产生上述说法。《啸亭杂录》成书于嘉庆十九年或二十年间，比乾隆的诗作晚了几十年。

东汉少帝的《悲歌》、梁元帝的《幽逼诗》、北魏孝庄帝的《临终诗》，都是被杀前的绝命辞。统治者间的残酷杀戮，临终者的绝望哀鸣，为攘夺帝位而展开的争雄角逐，这一切使我们窥见了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一面。至于齐梁时期的宫体诗，也可视为继玄言诗之后另一种逃避现实的反映。统治者鉴于血火刀光朝不虑夕的现实，遂寄情声色醉生梦死，“玩诗”如同犬马，词臣比于倡优，在诗歌创作上自然也是

一派脂粉气。简文帝除了艳诗之外，尚有些出入佛理的诗，表明其不但追求当世的享乐，还要祈望来世的幸福。但萧衍三父子却都死于非命，他们的某些诗作正是社会动乱的曲折反映。

综观帝王诗也隐约可见古代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发展的轨迹。小而言之，可以看出儒释道三家兴衰消长的脉络，为枯燥的哲学命题提供些生动的材料。在一些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萧衍的《会三教诗》，此作诗味枯索，但具体地反映了具有独创性的三教同源说，他在诗中表白自己三教皆精，而更服膺于释教的奥意。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延及唐宋之际已成定势，正是肇端于梁武帝的。唐玄宗的崇奉道教，宋徽宗的“溺信虚无”，在他们的诗中都有反映。唐玄宗尝云“自昔仰神仙”，宋徽宗侈言“羽鹤数千翔”，这是他们宗教思想的最直接表露。在乾隆的诗里可以鲜明地看到他对佛教的态度，比起上谕和文告来更少矫饰和虚矜。如《碧云寺》一诗有句云：“每参相与好，难论有和无。”即反映了他形式上虽然礼佛，但却没有拘执于佛教的教义。只是到庙中例行公事地参拜一通佛像，并无心纠缠到“有”和“无”的玄奥义理中去。再如“维摩已是为糟粕，梁武真成拾唾余”之句，公开指斥维摩诘讲经说法感动天女散花一事为不经之谈，而谈到梁武帝的佞佛之举更是嗤之以鼻。可见乾隆虽然建寺庙、谈禅机，但深心还是抵制佛教的。康熙也曾 在诗中明确宣示“禅徒空世界，仙每误炉丹”。（《机暇随

笔书怀》)斥仙佛之举为不经之谈。社会经济、科学的发展,最高统治者对于宗教的冷淡,共同促成了释老的衰微,康熙、乾隆的某些诗作也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尾间期的这一思想上的变化。

至于对儒学的崇奉,对于宋明理学的尊崇,在帝王的诗中更可以看到很多的例证,兹不赘述。

帝王的诗对于研究帝王本身,了解他们的思想、情趣、好尚,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诗以言志,歌以咏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一古训也多少冲淡了帝王的骄矜。南唐先主李昇先为徐温养子,曾作《咏灯》一诗:

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

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

婉曲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希望徐温能善待自己,日后必有所报。用这种自我解嘲的方式,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赵匡胤称帝前曾有《咏初日》一诗: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

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此诗颇见武人粗豪情态,“混一之志,先形于言。”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

朱元璋有一首《题扇赠胡月星》,其中有句云:“许朕作君王,果应仙人口。”反映了朱元璋自诩为真命天子的用心。此事在信史上没有记载,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璋托

言释道为“抬高自己，愚弄臣民的工具”。（《吴晗《朱元璋传》》）

南朝陈后主与南唐李后主同样为亡国之君，同样诗才俊发，但他们的品性节概迥异，比较亡国后的诗作即可发现个中差异。陈后主降隋后，在一次宴会上曾作诗为贺，并自愿请作封禅书，完全降到了文学弄臣的地步。李后主被虏后终日以泪洗面，长怀故国之思，年方不惑，双鬓早斑。（见《九月十日偶书》）他的诗和词一样，反映了亡国的愧疚和痛楚。“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清郭麐诗）后世所以对李煜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正在其杜鹃啼血般的哀鸣，不似陈叔宝之“全无心肝”（隋文帝语）。

我们觉得清雍正的诗歌创作对于研究其本人的性格情趣等提供了很多材料，皆为正史如实录、起居注等所不经见者。雍正刚毅果断，但失之急躁，所以康熙曾训诫他遇事要“戒急用忍”。他即位之初即迭兴大狱，铲除政敌，手段十分严酷。再如打击“科甲朋党”，处理吕留良文字狱等都表现了他的严刻峻急。但他的诗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出一种渊冲恬穆的意境：春兰秋菊，水木明瑟，曳杖闲游，流风回雪。

“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年荣辱镜中花。”完全是一派恬淡的隐者情怀。从他的诗中寻不着一丝躁竞之态，即使是当了皇帝，其诗风和诗题都没有什么改变。诗如其人，这至少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另一面：在峻急刻烈之中也追求安宁和恬适；虽贵为天子，仍不免世大夫习气；虽恪守儒家平治天下

的准则，也不免老庄无为思想的成分。

乾隆四十年，弘历于避暑山庄作了《林下戏题》一诗，并立卧碑于山庄松云峡之中。诗云：

偶来林下坐，嘉荫实清便。

乐彼艰俸指，如予未息肩。

炎曦遮叶渡，爽籁透枝穿。

拟号个中者，还当二十年。

诗中感慨于安享林泉之乐的致仕大臣已存世无多了，而自己仍孜孜于政事，盼望着二十年后逊位息肩。由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三年（即逝前一年）的二十三年之间，他前后以同一诗题作诗七首（均刻于同一碑上），从中可以看出乾隆晚年心的历程：一方面醉心于乾纲独断，一方面企盼于息虑宁心。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困扰着望九遐龄的老皇帝。

通过乾隆的诗，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即对诗人吴伟业和钱谦益的迥然不同的态度。二人同是明之旧臣，诗家泰斗，在明末清初的诗坛上有很大的影响。明亡后二人同仕清朝，衡诗作难强分伯仲，论品行均大节已亏。而乾隆对他们的态度却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区别。兹引录二诗如下：

题吴梅村集

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

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

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

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

观钱谦益初学集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

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

从上述二诗可以看出，乾隆对吴梅村的诗激赏不已，至方之以诗圣杜甫。联想到在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中，那些“藻思绮合，清丽芊眠，激楚苍凉，风骨遒上”的评语，很难说没有反映出乾隆本人的态度。而乾隆对于钱谦益其人其诗是深恶痛绝的，上诗指摘钱诗喜谈禅理，但缺少灵性，这还是对的。但说钱诗只配盖酒坛子，却过于不公了。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其所以尊吴抑钱，很大程度上出于鉴赏心理上的因素，作者更偏爱于吴诗“清丽芊眠，激楚苍凉”的风调，而这种思想的表露似以诗为宜。

帝王的很多诗作也直接地反映了某些宫廷生活，宫廷习俗，而这些都是正史中很少记载的，适成为窥见重重帝阁的一个窗口。梁简文帝的《咏内人昼眠诗》、梁元帝的《戏作艳诗》等，是他们淫靡生活的真实写照。梁元帝的《送西归内人诗》反映了皇室中兄弟阋墙，美貌女子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金章宗的《软金杯词》表现了饮酒作乐之别出心裁。唐玄宗的《观拔河俗戏》和宋徽宗的宫词《土牛》都描绘了

一些宫中生活场景和有异世间的民俗现象。如《土牛》一诗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鞭春牛之后，农夫竞分牛土以祈年，宫女争求牛土以祈福。考宋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关于鞭春的记载都很简单，因而此诗的资料价值就不待言了。康熙的《初秋晚雨后观仪器》，道光的《咏眼镜》，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风东渐后西洋文明对中国的影响。

总的来讲，历代帝王诗歌的历史的、认识的价值更高于其艺术欣赏价值。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除了曹氏父子、李煜的作品史有定评外，象萧梁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的诗作也应给以充分的注意。清沈德潜曾云：“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矫然独异，风气将转之候也。”这种评价还是允当的。对于齐梁诗（包括帝王之作）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代某些学者也进行了新的审视，指出：齐梁间“通过声律的提倡以及对各种诗体的追求，认识了艺术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为我国诗歌在古体之外开出近体一大宗，在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葛晓音文《齐梁诗的功过》）准此，梁陈诸帝在艺术上的努力和成就，还应客观地、勇敢地给予承认。

唐代诸君能诗者多，太宗、玄宗为其中著者。前世论者言：“唐文皇（太宗）以武功平隋乱，又以文德致太平，于篇咏尤其所好。辞气壮伟，固人所脍炙。”（宋陈岩肖《庚溪诗话》）

明胡应麟认为：宋室诸帝虽皆留意翰墨，而篇什佳者殊寡。高宗之《中和堂诗》“宏壮和平，大有魏晋遗意。”

“孝宗飞来峰一歌（《冷泉堂诗》）亦有格。”（见《诗薮》）

清史家赵翼曾指出：金代的文章诗词，能自列于唐宋之间，非辽所能及。他特别标举海陵王完颜亮之作为“奇横可喜”。今之史家亦云：“完颜亮作诗言志，笔力雄健，气象恢宏，其诗与其人极相似。”（张博泉著《金史简编》）另有金章宗的诗纤巧绮丽，也有可观者。可见这些少数民族帝王对于汉文化的习染之深。

朱元璋称帝后常与臣属讲求诗文，自己也时常作诗，他的诗“又粗豪，又有些风韵”（吴晗著《朱元璋传》），直抒胸臆，明白如话。明宣宗之作传世较多，他的七言歌行体流利婉转，清畅和谐。

清代诸帝多有集行世。康熙的诗笔力雄健，意蕴较深。乾隆的诗太多太滥，一题至有数百首之多。但其题材广泛，学问博洽，自有其不可忽视之处。其诗作之富，为古今诗人之冠，总数达四万三千五百八十四首。其后嘉庆、道光也多以学问为诗，淡乎寡味，堕入诗之末流。嘉庆诗亦达一万五千七百六十首，仅次于乃父。以数量而论，在古代诗人中可排第二位。他有很多咏史一类的组诗，多达百首之多，又效其父作《全韵诗》两组，共二百十二首，体制宏大，铺排敷衍，不避险仄。虽弊在炫学，亦足征博雅。道咸以降，无复可称，国事日非，诗亦闕茸。诸帝皆殷注于壤内，屡

形篇咏；复耻见欺于外敌，未见歌吟。

历史上很多皇帝都编有御制诗集，但多已散佚。唯清代时间晚近，保存较为完整。至于帝王诗选的编辑工作，历史上也曾有人做过。据宋王应麟《玉海》载：北宋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命词臣陈彭年纂集历代帝王诗歌，上起自舜，下迄于唐。宋真宗亲自作序并名之曰《宸章集》。王应麟称此集“编次尤难，盖散在群籍，非广读不能见也。”这是愚陋所知的唯一的帝王诗集，但《四库全书》未见著录，很可能已经散佚。

历代词臣对于本朝皇帝的御制诗，无一例外地是一片谀颂之词。如“鸿辞奥指，昭炳日星。”（明臣赞朱元璋诗语）

“天机所到，造化生心。”（清臣赞乾隆诗语）溢美无边，率皆如此。但正如欧阳修所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见苏轼《答谢民师书》）只有今天，我们才能正视这一存在，对于帝王诗作加以整理和研究，以期做出近于事实的判断，那种人云亦云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如民初有人以“令人气绝”之语评价康熙诗，这显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某种偏激情绪的反映。今天，人们谈起乾隆诗，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但缺少认真的研究和评介。这使我们想起南宋史学家郑樵的一段话，他批评了某些不谙史实徒事褒贬的清淡家：“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郑樵《通志·总序》）

皇帝诗作，例有词臣代为捉刀之事。但代作也不能与皇帝的风格相去太远，不然是不会得到皇帝的认可的。朱元璋现存诗百余首，基本上体现了这位马上皇帝粗豪质直的面貌，未见有风格扞格之处。明末钱谦益所编《列朝诗集》一书，其中明宣宗的一首七律《平沙落雁》与格律有忤，钱氏指出：“五六两联连押二秋字，因出圣制未敢轻议。”钱氏去宣宗朝已远，犹存畏心，当朝词臣更不敢轻易改动了。

皇帝还有些游戏笔墨收入集中，编者也一仍其旧，不敢妄置一词。如明宣宗有《御制偶成诗》（见钱谦益《列朝诗集》），是一种回文诗的形式，在版面上作环状排列（另有七言藏头诗亦如是）。梁元帝的《春日诗》是一首五言古诗，句句含春字，短短十八句，春字竟达二十三个之多。乾隆有一首《鸡卵》诗（《御制诗初集》卷九）更使人啼笑皆非：

无鸡卵不生，无卵鸡不成。

循环谁为始？倩彼鸡卵评。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推断，皇帝的诗作基本保存了自己的面貌和风格，没有切实的根据，不好打入赝品之列。

本书起于汉高祖刘邦，迄于清季之光绪帝，共七十五帝，选诗二百八十八首。对于作者除一般简介外，对其诗作也尽可能做些概述。参核史料，对于部分诗作的系年、背景和本事也做了必要的注释。需要提及的是，本书较多选录了梁陈间的宫体诗，特别揭著了那些“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